

红军长征

人物谱

主 编 刘培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K264.4

18

红军长征人物谱

刘培一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军长征人物谱/刘培一主编.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 8

ISBN 7-5000-7558-8

I. 红… II. 刘… III. 中国工农红军 - 二万五千里长征 - 军人 - 生平事迹 IV. ①K264.406 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585 号

责任编辑: 刘培一

责任校对: 崔娟娟

封面设计: 马堪岱

红军长征人物谱

刘培一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城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地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字数: 42.4 千字 印数: 5000 册

ISBN 7-5000-7558-8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毛泽东在长征中	黄允生 1
长征中的周恩来	力平 彭红 47
朱德在长征中	刘家国 67
陈云独特的曲折征程	迟爱萍 熊亮华 91
任弼时与红军长征先遣队	刘秉荣 115
挑起党中央总书记的重担 ——张闻天在长征中	程中原 148
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 ——王稼祥在长征中	朱仲丽 183
横刀立马彭大将军	蒋宝华 门吉寿 210
斩关夺隘建奇功 ——刘伯承在长征中	辛子陵 246
贺龙与喇嘛	刘秉荣 263
长征路上不息的战鼓 ——罗荣桓在长征中	王援朝 283

长征转战建奇功	张光本	299
长征中的聂荣臻	谢来凤	315
耿耿忠心放光华 ——叶剑英在长征中	乔 章	352
长征中的左权	左太北	372
陆定一长征中的二、三事	陆 德	406
谭政大将在长征途中	张喜德	418
征途中的虎将军徐海东	张 麟	442
勇征善战的王树声副总指挥	张光本	474
长征中的萧克	孙彦新	495
长征三提 ——跛腿将军万里行	苏士甲	511
长征途中的苦与乐 ——摘自李志民回忆录	刘 平	526

毛泽东在长征中

黄允生

毛泽东本来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但长征以前却接连遭到当时“左”倾领导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赣南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会后被剥夺了在中央苏区的党的领导权;宁都会议又受到错误批判,并被剥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批“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头子“邓、毛、谢、古”为名,把一大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打下去,使各方面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害。正如博古在中共七大时所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①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情况更加恶化。博古把他捧为“太上皇”,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权交给他,推行“左”倾“进攻路线”,在形势不利时又实行消极防御,完全抛弃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基本作战原则。他们先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当红军受控而陷于被动时,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命令红军“分兵把口”、“短促突

^① 博古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击”，同国民党军拼消耗，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使中央苏区越来越小；最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虽然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但只有极少人在秘密运作，没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使一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高级指挥官都并不清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当时正靠边站、挨批判的毛泽东坚持了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向中央提出到赣南省视察，很快得到批准。博古、李德曾打算不让毛泽东同中央红军一起转移。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①

他们最后仍让毛泽东同红军一道长征，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同两个月前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电示有关。那时，博古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要他给王明带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周（指周恩来——引者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说：“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毛泽东能抓得大事”。对于博古的口信，共产国际有正式电报作出回答。吴亮平回忆道：

“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的情形之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

^①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①

这些都是博古、李德不能不同意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一道长征的原因。

毛泽东刚到赣南省省会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这实际上就是在考虑中央红军长征从哪里突围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召开多次会议进行调查，还分别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国民党方面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② 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③ 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

① 吴黎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55页。

② 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34年9月20日。

③ 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

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15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

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①

由于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第一、第二道封锁线上虽都部署了兵力,但都不强,原因在于这个方向的主要防区属于粤军,而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的中央军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在夏季去南线粤赣省省会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正是利用这种矛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粤赣省委和省军区负责人商议后,调整了某些“左”的政策,在军事上摆正了“打”与“和”的关系,把大部队的的前沿调回后方,分小部队向粤军宣传反蒋抗日,使得中央苏区南大门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出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随后,陈济棠派人到中央苏区联系谈判事宜。中革军委经过研究,提出谈判方案,也派出粤赣军区负责人何长工和中央宣传部的潘汉年到粤军辖区谈判。10月初,双方代表经过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这就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21日夜,红1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

^①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期。

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① 11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②

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

^①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77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3页。

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22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研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①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

①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① 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②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①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 113 页。

②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124 页。

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①

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②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

^①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1、442页。

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①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②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

①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2日。

②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5、56页。

‘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①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5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②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③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1月7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5、446页。

②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6页。

③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8期。

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1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2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①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①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14页。